

# 论城市记忆与博物馆研究的缺憾

## ——多元的城市记忆载体与主观的城市记忆

陈锦航

**摘要：**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城市记忆的诸多载体，博物馆主要与古建筑、遗址、名人故居结合，为城市记忆提供承载形式，而非城市记忆承载的主体；然后结合对城市记忆与博物馆研究的国内外文献综述，提出了主观与客观两类城市记忆，诸多研究都过度关注博物馆所呈现的客观城市记忆，而忽视了完整的城市记忆还包含了存在于人脑中的社会记忆。

**关键字：**城市记忆 载体 博物馆 主观与客观

不少国内对博物馆与城市记忆的研究和论述存在两个主要缺陷，这也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其一，没有在全球范围内探讨博物馆究竟在诸多的城市记忆载体中处于何种地位？博物馆究竟是以城市记忆的主体存在还是以辅助形式存在？其二，缺乏研究综述与研究推进，只要博物馆有城市记忆的展陈就算是完成了城市记忆的建构吗？城市记忆与社会记忆有何关系？

### 一、主观与客观城市记忆

#### （一）文献述评

##### 1.国内关于博物馆与记忆研究

不少研究都认识到了博物馆是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城市博物馆通过收藏实物、建立社区博物馆和遗址博物馆的方式来留存城市记忆<sup>1</sup>；博物馆作为一座城市历史记忆的收藏者和维系者，在历史街区的保护和更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up>2</sup>；还承担了民族文化遗产、推动城市文化发展的功能<sup>3</sup>。不少博物馆也改变展陈方式在展陈中采取一些策略<sup>4</sup>、开发能够承载城市记忆的博物馆纪念品<sup>5</sup>、运用信息技术<sup>6</sup>，来彰显城市记忆。但是上面一类研究都过于浅显，已有研究者运用记忆理论，研究了参观者如何建构城市记忆的解码、编码过程<sup>7</sup>，但是该研究并未探讨个体城市记忆如何上升为社会城市记忆。

##### 2.国外关于博物馆与记忆研究

国外关于博物馆与记忆的研究这要三个类型和特点：首先是在博物馆与记忆的实证研究，采用心理学与社会学关于记忆量表与问卷，通过在博物馆内收集资料，展开记忆的相关研究，如老年和儿童群体更容易受到博物馆展览内容影响，进而记忆认同发生改变<sup>8</sup>；在艺术对博物馆的研究中，对比了观看艺术展览与在实验室通过计算机模拟欣赏方式造成的记忆差异，发现艺术的经验依赖于组织环境中存在的资源<sup>9</sup>。

其次是涉及苦难记忆与博物馆的相关研究较多，如对柬埔寨红色高棉 1 号博物馆<sup>10</sup>、智利的记忆和人权博物馆中表现出的道德排斥和道德包容的冲突<sup>11</sup>；创伤冲突后社会对于哪些过去的痕迹应该保留以及以何种方式在博物馆中进行精确选择的<sup>12</sup>。

最后是博物馆中对于社会记忆的反思研究，博物馆，纪念馆和其他历史古迹是建立集体记忆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场所<sup>13</sup>。传统西方博物馆呈现社会记忆是有局限的，如对怀俄明州科迪的布法罗比尔博物馆和开普敦的第 6 区博物馆进行的相关研究中，揭示了其中的男性气质和白人的刻板形象与西方中心主义<sup>14</sup>；博物馆所展览的国家历史和个人记忆往往不一致，当公众成员发现他们对过去的记忆或他们对博物馆体验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时，就会发生一种“扭曲<sup>15</sup>”；面对这些批判，一些博物馆也进行了转变，新博物馆的主要特点是，它们设计了戏剧性的展陈表达，以唤起游客的情绪反应<sup>16</sup>；使他们感同身受，并与个体受害者和受害者，或与他们自己的同时代远方群体拉近记忆认同距离<sup>17</sup>。

上述研究特点与西方博物馆在今天的社会地位背景有关，过去，博物馆通常被视为致力于保护有价值物品和公众教育的机构，随着多元文化、政治文化身份、历史记忆等议题涌入博物馆<sup>18</sup>，西方博物馆成为了一个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战场或兜售记忆叙事的市場<sup>19</sup>，博物馆和纪念馆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sup>20</sup>，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为了回应现代博物馆遭受到的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批评，西方博物馆化在展陈上进行了重新表达和重新定位。

## （二）作为社会记忆的城市记忆

纵观国内外研究，发现相比国外研究，国内关于博物馆与记忆的研究还是有明显的差距，似乎所有的国内研究都没有文献综述，研究比较粗浅，缺乏实证研究，或以某一个博物馆为案例进行说明，没有研究推进性，只是浅显的涉及到了博物馆对于城市记忆的意义和评论，博物馆展陈包含的城市记忆仅仅是信息，如何能让信息成为盛会记忆的一部分是需要宣传、需要从信息转化为个体记忆，进而上升为具有社会属性的城市意义，国内的研究则想当然的默认有了博物馆关于城市的展陈就会有城市记忆，其实这完全之两回事，城市记忆存在于两种形式，其一是以信息形式、通过展陈、展品承载的客观城市记忆，其二是作为盛会记忆的一部分，由具体的个人群体、承载的主观城市记忆，客观城市记忆通过心理学记忆过程进入个体记忆，进而在社会力的作用下，上升为社会式的主观城市记忆。

主观的城市记忆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记忆，个人的记忆受到社会、群体、国家的制约。具体到博物馆而言，就是哪些记忆被选择博物馆选择呈现？哪些被遗忘或者忽视？

博物馆所呈现的城市记忆能否影响参观者，进入它们的个体记忆，进而推进城市认同和城市道德共同体的归属感。

表 1：两类城市记忆表

城市记忆的两类类型		
类型	客观城市记忆	主观城市记忆（社会性）
媒介	遗址、遗物、信息	语言、大脑记忆过程
载体	博物馆、历史建筑物、纪念碑等	人（个体——群体）
二者转化过程	二者互相影响，客观城市记忆通过信息传播、心理记忆过程共情方式进入个体记忆，个体在于其他个体互动、公开纪念、舆论、宣传上升为社会记忆；不同社会群体展开公共讨论、城市研究者的批判和反思改变着客观城市记忆的传播内容。	

当然，客观而言，城市记忆对于中国而言还是一个新兴议题，西方博物馆则已经成为一个文化、认同、身份的战场，中国与国外的国情确实有差异，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国内研究完全不顾全球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缺乏学术推进意识，而仅仅多局限于科普评论与经验层面，这也与我国博物馆学整体还处于经验而非中层理论阶段有关。西方研究也并非没有瑕疵，正是由于今天西方博物馆多是一个文化战场，研究多涉及文化政治议题，具有反思与社会批判精神，但是反过来则受制于政治正确、多元文化环境的局限，使得研究更加偏重记忆、文化与政治身份认同，而非博物馆，博物馆本身则只是一个研究场域或实证数据的采集点。但是博物馆与记忆这一议题确实需要对于社会记忆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综上，国内关于博物馆与城市记忆的相关研究还需要结合案例深入讨论主观城市记忆与客观城市记忆的关系与互动问题，特别要结合社会记忆理论，研究博物馆怎样塑造和建构了作为社会记忆的城市记忆。上述研究综述还是有一定局限和不足，如果需要对博物馆与城市记忆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不仅要涉及社会记忆议题的综述、还需要对城市规划、城市认同、城市映像等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评述。

## 二、形式还是主体——博物馆是城市记忆最好的载体吗？

纵观全球，博物馆虽然是城市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并非是最好的载体，城市记忆的承载者多种多样，如古建筑遗存、遗址、名人故居、雕塑、纪念碑、路名、还有生活在城市中老居民的记忆。其中以古建筑和遗址为城市记忆最重要的承载者。

以华沙为例，纳粹占领波兰后，系统性的规划了哪些华沙古建筑应被摧毁，并付诸实施，因为纳粹非常明白城市古建筑与民族认同的关系，系统的摧毁华沙古建筑是消灭波兰人抵抗意志，并使之精神屈服的重要手段。华沙人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即使在被占领期间，华沙的工程师与城市规划者还是顽强的在地下重新规划战后华沙重建并记录被摧毁古建筑信息，便于复原。1945年华沙摆脱战争后，便按原样重建城市，不仅保持了中世纪古城的风貌，而且兴建新市区，超过了战前的规模和水平。在重建过程中，保护和修复历史古迹的工作受到格外重视，战前市内 900 多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几乎都进行了修复和整饰，那些昔日的宫殿、教堂、城堡等更加显得巍峨壮观。所以城市古建筑，为城市记忆最重要的承载者。



遗址是位居第二的城市记忆承载者，一些遗址与博物馆结合，如柏林在前盖世太保总部建立柏林恐怖地形博物馆，位于工业工艺美术学校原址上，这座预制板房 1933 年 5 月成为盖世太保（国家秘密料）总部。展览厅建在盖世太保总部一座附属建筑的地基上，有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囚犯 1943 至 1944 年修建的厨房和餐厅。里面的图片展示了过去建在这儿的房子的历史、纳粹政权的出现与发展、其种族主义与扩张主义政策的后果、其对手的命运和其头目的生平等等。屋外木楼梯通向观景台。从观景台可俯瞰这片希特勒时期叫作“0 区”的工地。这里的展馆是 1986 年对公众开放的，1997 年开始又新建了一个博物馆。与此类似，华沙也建立了华沙盖世太保总部博物馆，它是华沙小有



名气的的自然与历史博物馆。我国的故宫博物院更是古建筑与博物馆结合的典范。



位居第三的是纪念碑，纪念碑是以公共标志物的形式记录城市记忆的方式，是西方自古罗马以来保存记忆的重要手段。1991年，联邦总务管理局的建筑工人在曼哈顿下城区发现了400多具男性、女性和儿童的骨骼。科学家证实，这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一个埋葬地点，宣称它是北美最古老和最大的为自由和被奴役的非洲人挖掘的墓地。2006年，通过总统公告，时任总统布什将非洲墓地命名为国家纪念碑，使之成为第一个献给纽约早期非洲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国家纪念碑。在这个纪念碑附近也以博物馆形式举办相应主题临展，是否在其遗址上建议永久博物馆尚存争议。

位居第四的是城市名人历史雕像，它与纪念碑类似，也是一类城市标志纪念物，中国与西方相比，雕塑的规模较小、所在位置也多、多不在城市中心位置，公共展示性也较低，这也中西方纪念文化差异所致。华沙起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地下军反抗德国占领军的战役。这场战役是在1944年8月1日开始的。波兰地下军的目的是想在苏联红军到达华沙前解放德国的占领，以避免受到苏联的控制。50,000波兰地下军采用了游击战对抗25,000德军，整个起义持续了63日，直到1944年10月2日，波兰军队方才向德军投降。在波兰方面有大约18,000名军人和超过250,000名平民死亡，另有大约25,000人受伤。德军方面有大约17,000人死亡和9,000人受伤。波兰地下军投降后，希

特勒命令德军将华沙夷为平地。结果 85%的地方都被毁坏。直到 1945 年 1 月 17 日苏军才进入华沙。对于华沙起义的纪念采取了纪念碑、雕像、周年纪念仪式相结合的方式。

位居第五的是城市中的名人故居，而名人故居也多会改造成纪念馆，如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以鲁迅纪念馆的生平陈列、鲁迅墓、鲁迅故居 三位一体。上海鲁迅纪念馆原与山阴路上海鲁迅故居毗邻，1956 年 9 月迁入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鲁迅故居位于虹口区山阴路 132 弄 9 号（大陆新村九号）。



对于鲁迅的社会记忆在今天逐渐多元和开放，最早鲁迅是作为左派文坛旗手和爱国者而被记录和呈现的，后来他的个人生活，与许广平的关系也逐渐收录到北京鲁迅纪念馆中，他逐渐以多元和生动的形象呈现于世人之间、他也并非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家，也并非一个拥护共产主义的左派，而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受到左翼文联排挤旗手，这也让纪念馆呈现的记忆更容易被参观者所接受而上升为社会记忆。

这里还是涉及到上面的问题，博物馆纪念馆呈现的记录怎样转变为社会记忆，过去有一个捐款实验，通过电话方式恳请潜在捐款者向战争孤儿捐献，一种是抽象的说服，即简述社会背景，要求捐赠；另一种是具体的叙述，尽管是虚构的，比如有一个叫某某的小姑娘、她怎样成为战争孤儿，她想上学，好像这些话从她自己口里表述。后一种方式能拉到跟多的募捐，我国希望工程采用一个女孩渴求读书作为宣传画也采用了同样共情的方式。

共情也更容易形成个体记忆，名人纪念馆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安妮·弗兰克故居是

一个受迫害作家的避难所，建于 1739 年，濒临运河的正面，二战期间的 1942 年，德国犹太女孩安妮为躲避纳粹的屠杀，躲藏在这密室中长达两年，写下了著名的《安妮日记》，它记叙了二战期间小作者一家和亲友为躲避纳粹而藏身阁楼的故事。安妮故居现在已成为博物馆，它是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及民族歧视的展厅，它时刻警戒着后人。故居中展出了《安妮日记》的原稿和当年的日用品，墙上日记中的段落表达了这位 13 岁少女的痛苦、寂寞、恐惧和期盼，进入故居至今仍让人感受到与世隔绝的窒息感。“我希望我死后，仍能继续活着。”安妮对生命的渴望深深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参观这一故居，你可能会潸然泪下，但肯定会打动你的心，产生共情，她也会进入你的记忆中。

位居第六的是档案馆，它确实不大起眼，只有去查档案的人才会注意到它对城市记忆的承载作用。

### 三、结论与讨论：作为城市记忆承载形式的博物馆

如在文献综述中所提，国内不少研究者都强调城市博物馆是承载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这一点看似毋庸置疑，但是也有所偏差。准确来说，博物馆是一种记忆的形式，当它与城市古建筑、遗址、纪念碑、名人故居结合时，更加强化了城市记忆的鲜活性和公众性，所以博物馆是作为城市记忆的形式而非主体存在的，博物馆以展陈的方式作为记忆留存与记忆创博的手段，发挥了形式和媒介的作用，是对已有城市古建筑、遗址、名人故居这些现有城市记忆承载主体的二次升华。博物馆也可以结合纪念碑、雕像等形成强化城市记忆的合力。

博物馆关于城市的展陈信息转变为要上升为城市记忆是一个过程，它需要舆论、宣传、纪念活动的推进，博物馆进而成为城市的标志，成为所在城市一个标志性景点，上面的案例也有涉及，柏林恐怖地形博物馆在建立之初只是一个在盖世太保总部遗址上的纪念碑，后面随着公共参与改建为博物馆；华沙起义雕塑群像与华沙盖世太保总部博物馆是纪念华沙起义活动的重要标志与场所，每隔十年，欧洲政要都会来此出席参加纪念活动，活动带来的舆论宣传和媒体曝光使得二者成为华沙标志性的城市记忆建筑物；非洲墓地国家纪念碑虽然没有建立永久博物馆，但是不同社会群体对于该遗址旁是否要建立永久博物馆的争议本身，就使得它成为一个公共议题，反过强化、塑造了纽约关于非洲黑人的城市记忆。城市所经历的苦难记忆不仅会成为城市记忆，也会上升为全人类的苦难记忆，具有全球影响力，这就是为何西方涉及城市记忆的博物馆多展现人类的苦难史，悲剧唤起了人类的同情，苦难更能够铭刻人心，不论你是否来自不同的国家、种族、城市，这些城市博物馆展示的人类苦难记忆都更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促进人类的反思。

(原载于《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论文集(2018-2019)》)

#### 参考文献:

- 1 杨红梅:《广义博物馆观念下的博物馆与城市记忆》,载《城市记忆的变奏——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论文集(2013-2014)》,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2 姜晔、路懿菡:《博物馆在城市记忆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大连东关街为例》,载《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年第6期。
- 3 侯爱芹:《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交融下城市文化建设之博物馆的作用》,载《城市记忆的变奏——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论文集(2013-2014)》,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4 宗轩:《记忆城市——新唐山博物馆记评》,载《时代建筑》,2011年第6期。
- 5 袁俊:《浅析信息技术在保留城市记忆中的作用》,载《城市记忆的变奏——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论文集(2013-2014)》,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6 张牡婷:《博物馆纪念品——把城市记忆带回家》,载《城市记忆的变奏——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论文集(2013-2014)》,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 7 文彤、刘璐:《博物馆文化展演与城市记忆活化传承——基于旅游留言档案的文本分析》,载《热带地理》,2019年第2期。
- 8 A. Crane. Memory, distortion, and history in the museum[M]. 2004 - books.google.com.
- 9 Brieber, David, Nadal, Marcos, Leder, Helmut. In the white cube: Museum context enhances the valuation and memory of art [J]. Acta Psychologica, 2015, (4) 36-42.
- 10 Rachel Hughes, Nationalism and memory at the Tuol Sleng Museum of Genocide Crimes, Phnom Penh, Cambodia \ The Politics of Memory [M]. Edited By Katharine Hodgkin, Susannah Radstone,
- 11 Susan Opatow. Historicizing Injustice: The Museum of Memory and Human Rights, Santiago, Chile [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4, (2) 32-45.
- 12 Patrizia Violi. Trauma Site Museums and Politics of Memory: Tuol Sleng, Villa Grimaldi and the Bologna Ustica Museum [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2, (1) 36-75.
- 13 Greg Dickinson, Brian L. Ott, Eric Aoki. Museums Spaces of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Reverent Eye/I at the Plains Indian Museum [J].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2006, (6) 27-47.



- 
- 14 Greg Dickinson, Brian L. Ott, Aoki Eric. Memory and myth at the Buffalo Bill Museum [J].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6, (8): 85-108.
  - 15 Edited By Selma Leydesdorff. *Memory, Subjectivity and Recognition* [M]. eBook Published 12 July 2017. Pub. location New York.
  - 16 Edward T. Linenthal. The Boundaries of Memory: 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J]. *American Quarterly*, 1994(3) 406-433.
  - 17 Silke Arnold-de Simine, Jens Andermann. Introduction: Memory, Community and the New Museum [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2, (1) 1-7.
  - 18 Susan A. Crane. History & Theory Memory, Distortion, and History in the Museum [J]. *History & Theory*, 1997, (4) 44-63.
  - 19 Ann Reed. Sankofa Site: Cape Coast Castle and Its Museum as Markers of Memory [J]. *Museum Anthropology*, 2008, (3) 13-19.
  - 20 Silke Arnold-de Simine. Memory Museum and Museum Text: Intermediality in Daniel Libeskind's Jewish Museum and W.G. Sebald's Austerlitz [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2, (1) 14-35.